



好读书

读好书

“人民”名义下的殊死博弈

——读周梅森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

□白烨

从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《人间正道》之后，周梅森连续推出《天下财富》《中国制造》《至高利益》《绝对权力》等长篇小说，并将这些小说原作先后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，引领了一个时期小说与影视两个领域里的现实题材创作热潮。

周梅森的这些作品，以改革开放为基本背景，以各级官场为主要场景，主写置身其中的各色人等的义与利的抉择，权与欲的交织，情与法的较量，因为包含了腐败与反腐败的内容，常常被人们看作是反腐题材作品。周梅森本人对于人们送上的“反腐”这顶帽子，不仅不愿领受，而且一再推却。他在2007年接受《北京青年报》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：“中国现阶段的腐败问题是不能回避的，总会不自觉地有所涉及，像《绝对权力》看似从反腐线索展开，但其包含的意义却不是单纯的反腐。”由此他吁请人们：“请给我的作品一个准确的定位。”

近读周梅森的长篇新作《人民的名义》，并观看了中国话剧院演出的同名话剧，感受良多，感触颇深。我觉得，对于周梅森的小说作品，确实不能用“反腐”一词一言以蔽之。他的作品，并不纠结于腐败事件本身，也不只写“打虎”的英雄人物，而是以官员涉贪为线索，公权私用为由头，揭示权力运作中的某些畸态，官场文化的某些霉变，进而察观“人民”名义的虚与实，拷问人性深处的恶与善。这样的作品直面政坛现实，主写政界事务，直击官场生态，塑造官员形象，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小说。我以為，以此来看待周梅森和类似的小说写作倾向，更为切实，也更为确当。

热播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成为时下一个很受关注的话题，周梅森的同名原著小说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。虽然涉及反腐与官场题材，但周梅森认为《人民的名义》既不是所谓官场小说，也不是反腐小说，“更倾向于它是一部政治小说”。



《人民的名义》
周梅森 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以周梅森的近作《人民的名义》为例，在这部作品里，H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陈海在调查一桩特大贪腐案件时遭遇车祸身亡，只是整个故事的一个引子，它相继引来的，是踌躇满志的新任反贪局局长侯亮平的临危受命，是居心叵测的公安厅厅长祁同伟的如坐针毡，是心怀鬼胎的省委副书记高育良的惴惴不安，以及省会京州政坛的暗流涌动。摆在侯亮平面前的是两种决然不同的选择。一是认可陈海是偶然车祸牺牲者的虚假结论，放过案件背后的一千人马，维持H省和京州市政坛的表面平静；二是接续陈海未能完成的工作，锲而不舍地追查下去，揭开事情的原本真相，牵涉任何人也在所不惜。侯亮平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者，因为他意识到陈海的遇害，说明他离“巨大真相”已“近在咫尺”，他只能在陈海止步的地方接续前行，继续战斗，以查清事件幕后的真相所在。

一场你死我活的博弈、虎口拔牙的战斗，由此拉开了序幕。先是祁同伟从老同学的角度软硬兼施地逼他就此罢手，后是高育良以老师的身份苦口婆心地规劝他急流勇退。当这一切都打动不了侯亮平，劝阻不了侯亮平时，便图穷匕首见，祁同伟在高育良的默许之下，捏造了受贿的莫须有罪名，使侯亮平在关键时刻被停职反省。正是在这或明或暗的较量中，氤氲不明的搏杀中，侯亮平终于摸清了祁同伟这个昔日老同学的罪案底细，也完全看清了高育良这个当年的好老师的虚伪面目。在情感与法理、情谊与法律、情分与法度的抉择中，越来越清醒，也越来越坚定，他坚守正义，毫不畏惧，直到穷凶极恶的祁同伟无奈中饮弹自尽，高度自信的高育良因失

算而绳之以纪。

作品里饶有意味的是侯亮平要处理高育良的前秘书陈清泉时，去向高育良汇报，高育良煞有介事又言之凿凿地对他说：“亮平，要给我记住，我们的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，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，我们的公安叫人民公安，所以，我们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，永远，永远。”而当高育良怂恿祁同伟、包庇赵瑞龙的渎职行为一一败露之后，面对最后来看他的侯亮平，他还大言不惭地侃侃而谈：“为官者就得心正，心正则心安，心安则平安。”“公生明，明生廉。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，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。”这些从高育良嘴里顺口而出的话，曾让当初未识其面目的侯亮平为之激动，为之振奋。但已知他假公济私还振振有词，劣迹斑斑还夸夸其谈，就让侯亮平不得不为之震惊，为之讶异，乃至为之羞愧。因为，“人民”二字他挂在嘴边，脱口而来，但并未真正走心、入心，那只是他弄权上位的广告词和争权夺利的遮羞布。这也说明，为官者尤其是像高育良这样的高官、祁同伟这样的要官，既不幼稚，也不糊涂，他们是明明白白地糊弄人民，清清楚楚地谋取私利。而因为他们脸上戴了光鲜的面具，嘴上挂着正确的大话，人们既难以看得清楚，也难以很快识破。而这种既有官位保驾，又有大话包装的贪官，是最有害的，也是最可怕的。

《人民的名义》所揭示的由各种关系所维系、由各种力量所推导的官场生活，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。就H省与京州市而言，这里既有祁同伟与高育良等人构成的政法系，又有李达康、刘新建等人结成的秘书系，还有副国级赵立春及其儿子赵瑞龙形

成的赵家帮，以高小琴为主的以情带商的奸商帮，等等。这些派系与帮派的存在，既使官场政治生活更显波诡云谲，又使反腐斗争加倍复杂。而长期浸淫于官场，又会有种种诱惑引诱人、腐蚀人。正如高育良自道的那样：“中国的改革开放浩浩荡荡，每个人都身处洪流之中，其中，有人因为自身的努力幸运地站在潮头之上，潮头之上风光无限，诱惑无限，但也风险无限，就看你如何把握。”有的人站住了，有的人倒下了，有的人前行了，有的人后退了。差异与分别，正在于人性的放纵与持守，信仰的放弃与坚守。对祁同伟、高育良而言，官场就是魅惑人的名利场，在这里可以结党营私，自谋私利，而对陈岩石、侯亮平来说，官场就是一个冶炼人的大熔炉，在这里可以百炼成钢，更为坚强。两类人物，两种选择，两种结局，真正的试金石与分水岭，仍然是“人民”。那就是，是把“人民”作为名义挂在嘴上，还是把“人民”作为依托放在心上。而侯亮平与祁同伟、高育良等人的不同命运结局也告诉人们，真心实意为人民的，人民始终是其坚强的后盾，而虚与委蛇人民的，人民终究会将其唾弃。

以贪腐事件和“带病”官员为标本，来深入探悉政治生态现状，发掘其中的痼疾所在，并对不同政治选择背后的人生理念进行辨析，让人们在认识现实政治的同时，反观人生，反思人性，反求诸己，这应该是《人民的名义》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。正是在写出当下官场领域的政治生态，以及官场人物的内心意义上，这部作品不仅有力地超越了一般的反腐题材作品，而且也把当下政治小说的写作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
翻译家许渊冲的诗译人生

央视《朗读者》节目播出后，96岁高龄的翻译家许渊冲迅速走红。许渊冲从事文学翻译六十余年，被誉为“诗译英法唯一人”。近日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《梦与真：许渊冲自述》是迄今为止许渊冲最完整的人生自传，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追梦人生。



《梦与真：许渊冲自述》
许渊冲 著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几十首毛泽东诗词。在翻译《为女民兵题照》中的“不爱红装爱武装”时，他把“红装”译为“powder the face (涂脂抹粉)”，“武装”译为“face the powder (面对硝烟)”，恰到好处地表现了“红”与“武”的对应和“装”的重复，堪称妙绝。但他这样“少而精”的翻译，在当时却招来了批斗。

“文革”后，许渊冲出版了多种唐诗宋词的英译本和法译本。对于诗的译法，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在《中英诗译比录》序言中认为散体译文更能达意，更符合原诗风格，许渊冲却认为自己的诗体译文无论是达意还是风格，都胜过散体译文。把自己的意见写信告诉吕叔湘，吕叔湘并不认为他是狂妄自大，反而约他合作重编《中英诗译比录》。

围绕翻译的“真”与“美”、“神似”与“形似”等问题，许渊冲与诸多翻译名家产生过争论，即使面对权威，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。

翻译家王佐良认为许渊冲的翻译是“鸳鸯蝴蝶派”。两个人最早的分歧因瓦雷里写灵感的诗是直译还是意译而起。瓦雷里说灵感来得快，去得快，来无影，

去无踪，像美人更衣一刹那露出的胸脯。诗中最后一句，王佐良的译文是“无影也无踪，换内衣露胸，两件一刹那”。许渊冲译文为“无影也无踪，更衣一刹那，隐约见酥胸”。许渊冲认为王佐良用的“胸部”一词没有美感，因为它既可指男也可指女，用的“酥胸”才有朦胧美。许渊冲把王佐良的翻译比作“外科派”，好比一个伤兵中了箭，外科医生只是把箭断了，取出来，但毒还在里面；而他自己是“内科派”，不仅把箭拔出来，还把体内的毒也取出来了。

国内出版的《红与黑》有多个版本，先后有赵瑞蕻、罗玉君、郝运、闻家驷、许渊冲等二三十人译过。

《红与黑》里有句话，直译过来是“市长夫人，她死了”，许渊冲译文为“市长夫人，魂归离恨天”。

翻译家赵瑞蕻批评说，翻译必须硬照着原意，用朴实流畅的汉语来翻译，“为什么加上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？”许渊冲坚持认为，市长夫人并非正常死亡，是含恨而死，仅仅直译为“她死了”，包含了含恨而死的意思，他的翻译更贴切。翻译家冯亦代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直指“魂归离恨天”是从《红楼梦》中偷来

的。许渊冲则认为，“离恨天”并不是《红楼梦》才有的，是从《西厢记》中来的，难道《西厢记》偷了《红楼梦》吗？

关于诗词，许渊冲与杨振宁也有过讨论。两人是西南联大的同学，1997年久别重逢时，许渊冲送给杨振宁一本他翻译的《中诗英韵探胜：从〈诗经〉到〈西厢记〉》。杨振宁看后问道：晏几道《鹧鸪天》中“桃花扇底风”怎么成了“桃花扇影风”？许渊冲解释，这句诗有两个版本，“扇底风”写实，“扇影风”既写景又写情，所以最好，科学的公式是 $1+1=2$ ，翻译艺术的公式是 $1+1>2$ 。

许渊冲的译文所追求的就是要胜过原文，文学翻译应该成为翻译文学，翻译作品本身也是文学作品，要尽可能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全世界的美，“创造美是人类最高的幸福，这也就是我人生的意义”。